

“三藩之乱”影响下陈梦雷诗文的情感内涵

张晓红, 岳梦思

(集美大学 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陈梦雷悲剧人生的根源, 在于“三藩之乱”。其坎坷的人生、丰富的阅历以及复杂的情感体验在作品中得到了真实而充分的表现, 具有感发人心的力量, 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遭遇坎壈的悲哀、忠孝两难的痛苦与伪降而心迹难明的苦闷; 忠君报恩的至诚和无奈; 欲孝而未孝的痛楚以及知音难觅的孤独与朋友失信的痛恨。

[关键词] “三藩之乱”; 陈梦雷诗文; 情感内涵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9) 03-0081-07

陈梦雷 (1651 - ?), 字则震, 号省斋, 晚号松鹤老人, 福建侯官 (今福州) 人, 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 著有《周易浅述》《闲止书堂集钞》《松鹤山房诗集》《松鹤山房文集》等。考察陈梦雷的生平及文学、学术活动, 皆与“三藩之乱”密切相关, 但学界目前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与李光地的绝交及“蜡丸疏”是非之争、易学成就、《古今图书集成》编纂等方面, 对其诗文创作受“三藩之乱”的影响所形成的感人情怀尚无专文论及, 故此加以探析。

陈梦雷一生两度大起大落。康熙九年 (1670) 弱冠举进士, 选庶吉士, 为编修, 荣极一时, 是为一大起。然时运不济, 康熙十二年 (1673) 回乡不久即逢耿精忠叛乱, 被逼授伪职, 虽托病不出, 然终究论罪, 于康熙二十一年 (1682) 流放尚阳堡为奴, 是为一大落。居沈阳17年, 不断救赎, 于康熙三十七年 (1698) 康熙帝谒陵途中进献《圣德神功恭纪》诗而得赦回京, 为皇三子允祉之师, 是又一大起。24年后, 康熙驾崩, 雍正登基, 再谪黑龙江卜魁, 并终老其地^{[1]19}, 是又一大落。陈梦雷的一生, 是悲剧的一生, 而其悲剧人生的根源, 便是“三

藩之乱”。具体而言, 则为耿精忠叛乱, 史书多称“甲寅闽变/乱/警”“甲寅之变/乱/警”“闽藩作乱”“闽逆变乱”等。“三藩之乱”是清廷撤除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三藩王而引发的一场大规模叛乱, 自康熙十二年 (1673) 十一月吴三桂于云南起事至康熙二十年 (1681) 九月吴子世璠自杀, 长达8年, 烽火遍及云贵、川湖、闽浙、两广、陕甘等13省。“甲寅闽变”则始于康熙甲寅 (1674) 三月, 丙辰 (1676) 十月以耿氏投降结束, 不及3年。^①从历史长河来看, “三藩之乱”是个微不足道的事件, 然而对于与之遭遇的个体而言, 却影响深远。陈梦雷便是其中典型。

王揆在《松鹤山房诗集·序》说他如“自古劳人志士, 遭时坎壈, 其抑塞磊落之气无所表见, 往往发而为文”。甲寅闽变所造成的陈梦雷人生之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辱大荣, 实属罕有, 由此而表现于作品中的情感之丰富动人亦较少人能与之匹敌。时人以为贯穿陈氏诗文的核心情感是忠君与孝思, 如黄叔威说他“犹幸诗文寄托, 得以备征忠孝之情”; 林曦言其“有君而忠不得达, 有亲而丧不得奔, 恋君慕亲, 满腔热

[收稿日期] 2018-12-16

[基金项目]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 (1611)

[作者简介] 张晓红 (1971—), 女, 甘肃通渭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

①“三藩之乱”史实主要参考滕绍箴《三藩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与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二书。

②三人所言均载于陈梦雷《松鹤山房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本第17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康熙铜活字本。笔者所引陈梦雷诗文分别出自《松鹤山房诗集》(简称《诗集》)与《松鹤山房文集》(简称《文集》),后文不再一一加注。

血,皆于诗文发之”;诸葛璐也说“其为文……莫非忠君爱国之心。真屈、宋之精华”。^②观其诗文,围绕着忠孝之情,实有浓烈而丰富、直率而隐微、复杂而矛盾、哀怨而激愤的多样情感,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一、遭遇坎壈的悲哀、忠孝两难的痛苦与伪降而心迹难明的苦闷

23岁之前,陈梦雷的人生一路坦途,然而耿乱却突如其来,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让他面临忠孝、生死的艰难抉择。对于一个年轻生命而言,人生的重要篇章才刚刚奏响,怎能就此谢幕?建功立业尚需时日,又怎能如鸿毛般死去?父母年老,作为长子,又怎能轻易就死?正如他自言:“白发在堂,奚忍毁巢破卵;丹衷未泯,宁甘屈节事人?”(《文集》卷十一《丁巳秋道山募建普度引》)艰难取舍,他选择了尽孝,选择了活着,选择了投降。他在《文集》卷二《康熙十五年上康亲王启》中所言“夫人臣慷慨致身,自属分内,何至忍死偷生,行同狗彘?但受害于逆党,祸必及于老亲;正法于圣朝,或得矜全父母”当属肺腑之言。“三藩之乱”声势浩大,“伪檄所至,叛者四起,势如鼎沸”^[2],遍及十余省。当时形势,为国捐躯者少而被迫或主动从叛者多。耿氏叛起,除福州知府王之义、建宁同知喻三畏、闽县知县鞠维谦、侯官知县刘嘉猷乱中被杀,总督范承谟被缚外,唯汀漳道陈启泰“从容尽节,慷慨成仁”^[3],其他如巡抚刘秉政、按察司席式、兵道吕应斗、粮道李学诗、福州城守副将沈伟等皆投降^[4],原黄岩镇总兵武灏积极响应,提督王进功、兴化总兵马惟兴、海澄总兵赵德胜、漳浦总兵刘炎并道台、知府等俱从叛,海澄公黄梧也被迫剪辮^[5]。陈一介文弱书生,投降实属不得已之权宜行为。怀抱“若才足有为,徐图进取,隐忍依人,权以济事”(《诗集》黄鸢来《序》)的想法,他一面称病不任职,一面刺探消息,离间耿氏。但对于像他这样出生于清,得功名于清、期建功立业于清的旧时士人来说,这个选择自然是很痛苦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被刑的危险,也背负了“不忠”

的道德耻辱和无人诉说的孤独。耿乱一年多未作一文。康熙十四年(1675)六月,友人吴遵生突然病逝,巨大的悲痛使得他“情至文生”,写下了《祭吴瘦斋文》(《文集》卷十八)。此文开篇即讨论生死问题:“呜呼!天地间生必有死,理也。顾天地间,有可以死之人,有可以不死之人。可以死而不死,虽生而等于死。可以不死而死,虽死而等于不死。盖生必有所以生,死必有所以死,不得贪生而畏死,亦不得醉生而梦死。”借悼念吴遵生阐发其生死观——无论生死都要有意义。这也是他对自己选择“生”的解答。是年秋,城南寺院一棵巨松为风雨所拔,他触景生情,作《松树为风雨所拔叹》(《诗集》卷二)诗,以松“花卉摧残不知数,万树龙鳞尽剥落”的惨况,形象表达了自己的境况。虽然坚信“风清雨霁会有时”,松树将“结盖摩娑插霄汉”,但仍担忧“失势恐被连根折”。他在《诗集》卷四《乙卯秋送友之延津》向朋友倾诉“乾坤有恨凭谁诉,歌哭无声藉酒宽”的无助,《友人问疾座有鼓琴者命余续弹未果因贻余诗有琴声无复后人弹之句遂依韵奉和》抒发“苦调逢人未忍弹”的苦楚,卷二《赠黄西津总戎海澄》述说“愧我幽囚身困辱”的羞愧。卷一《乙卯拟古诗十九首》尤多无奈悲酸之叹,如“欲济无津梁,吞声自哽咽”(《行行重行行》)等。《西郊杂咏》其十四更以比兴手法,用南飞的鸿鹄比况自己和李光地,李在“弋人方见逐”时“耸翮入云端”,逃脱了耿的魔掌,自己却被网住而无法展翅,只能自我摧残:“一投网罗中,临风思振翰。樊笼不可骋,且复自摧残。”

耿乱中陈想有所建树,但因能力、方法和运气等因素,未获实绩,“空怀图报之诚,终无实效可见”(《文集》卷二《康熙十五年上康亲王启》)。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康亲王入闽,耿精忠投降,陈无功可表,只能上书请罪。字里行间,满是痛苦无奈。与此同时,李光地因蜡丸疏上达而升为内阁学士。耿变之初二人相约互保,此时李因丁忧而无法入京,陈只好于康熙十七年(1678)春独自北上,“自信三年心迹,舆论共嗟,不必待人而白”(《文集》卷十三《与李厚庵绝交书》)。至京后非但无路自白,更遭奸人诬告,言其为伪学士,不得不遣人回家请福

建督抚呈文。时新任巡抚吴兴祚在泉州,陈父便辗转求李光地代请,李却拖延未办。陈滞留京师,穷愁无奈,悲歌嗟叹,留下诸多篇章。

康熙十九年(1680)九月入狱,他一面悲愤于谣言之中伤:“方寸谁明谤早侵,蜡书偏阻爰书寻。”一面强调自己的忠心:“七载孤臣日夜心。”(《诗集》卷四《西曹坐系书怀兼寄两弟》其一)因无法自明,引李以救,而李仍敷衍拖延。在对朋友失信的痛恨中,又闻知母亲去世,悲愤交加,于次年八月写下《抒哀》(《文集》卷二十),以骚体赋的形式抒发了他的种种哀苦。有突遭变故的无辜:“体养志以娱亲兮,驾言返于故闾。就颺而致困兮,蜂蛰忽于所图。”有赤胆忠心而遭遇谣诼的无奈:“虑竭于公家兮,躬弗阅其非辱也……众口之烁金兮,萋菲积而日滋。”有入狱的催肝裂胆、神情恍惚之悲:“泪崩泉而继血兮,足蹢踊而就僵。神漠漠其阒灭兮,息噎奄其渺茫。”有对命运不公的控诉:“何昊天独降余以闵凶兮,夺所恃以何穷。”有软弱无力的哀鸣:“号天其莫援兮,触地而无傍”“哀罗织而莫舒兮,忘縲继之为痛”。陈寿祺《陈编修梦雷传》录此全文,以为“诡激于文词”,虽言过其实,“然志足悲也”^[6],可谓其抒哀之代表作。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发往盛京,“登途之日,奔车历险,支折体疲,裘敝絮单,朔风砭骨。加以两人耦系,起卧与俱,击柝稽巡,若囚犬彘”(《文集》卷十三《抵奉天与徐健庵书》)。境遇虽惨,然与心迹难明的痛苦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其苦痛在《诗集》卷一《丁卯初夏黄叔威以古诗八首见赠拟古妾薄命以答之》诗中表现得极为突出。此诗以夫妻比君臣,婉转缠绵地表达了他忠君而未能尽忠、忠心而无实效可验以致被贬的痛心,恋君而不忍死以及坚信君臣终将遇合、已将改过自新以耐心等待时机的心态,最后悲叹“我命实不犹,我意良苦辛”,并以“诉毕纵悲歌,永夜泣幽咽。边风动地来,长夏为飞雪”结束,令人唏嘘不已。

陈之遭遇耿乱,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奸人之诬告,也是自身无能为力的;蜡书受阻,心迹难辨,可谓“命奇”。其情思悲怨,其诗文动人。

二、忠君报恩的至诚和无奈

陈梦雷有着强烈的事功之心,本想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而耿乱却使他梦想破灭。陈之忠君当非虚言,杨文言说他“举家三十口坐困岩城,老亲稚弱,惴惴啼号,而仇人虎视,一岁濒死者,三四孱焉。瘠病介乎兵刃之间,而得当报称之思,百沮而不挠”(《诗集·序》)。杨是耿氏幕僚,是陈在耿乱期间的知情者,也是李、陈合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一生以布衣身份游走于高官显宦之间,与陈、李二人都保持着友好关系,其言可信。方外之人乔逸人也说:“丙辰(1676)之岁,余得晤省斋于许氏之拜云楼。时方在蒹葭白露中,结山榛隰苓之想。余每欲导之以返本归真,而省斋意在有所建竖,以报知遇,固匆匆未能也。”(《诗集·序》)建功以报君恩的想法是支撑陈梦雷活着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他博取统治者宽宥的关键。

陈三次递送蜡书失败,无功可表。耿氏投降后,他以“胁从”从宽处理,上亲王启请罪时坦言自己“不能轰轰烈烈立廉耻之防,为节义之倡”(《康熙十五年上康亲王启》),在“当诛三罪”的沉痛陈述中表达了未能尽忠守节的痛苦。康熙十六年(1677)中元节,当道山西意大师修斋以度幽冥而乞言时,他重申了蜡书道阻的无功之憾和方寸可对天地鬼神的忠贞,也表达了面对忠魂的羞愧:“蜡书道阻,重关逆命,固辞托病……昔日呼牛则牛,呼马则马,只是存方寸以对天地鬼神;今日生我国恩,死我国法,尚可沥生平以告君亲师友。读书济世,始愿已亏;蒙耻救民,此心犹在。愧忠魂于地下,徒伤死难之诸臣。”(《丁巳秋道山募建普度引》)

即便入狱,自觉如介子推一般有功而被祸,“逃赏介推徒自苦,焚山何事祸相寻”(《西曹坐系书怀兼寄两弟》其二),但仍以“勤思忠孝莫伤神”(其五)与两弟共勉。忠君之怀,令人动容。

贬谪沈阳后他在给李光地、徐乾学、富云麓等人的书信中多次诉说其伪降之实,以明其忠君之心。如《与李厚庵绝交书》云:

昔甲寅之变,不孝遁迹僧寺,逆党刃胁老父

追寻,不孝挺身往代,刀铍林立,蹀尸践血,不孝恬不为动。见贼不跪,语不为屈,以为苟得全亲一身,死不足恨耳。逆怒将置于刑,已复放归,不孝即削发披缁,杜门旬日。逆贼分曹授官,不以相及,自幸得免。贼臣教以遍加网罗,防杜不测,遂胁以伪官。然不孝就拘而往,不受事而归,辞其印札,不赴朝贺,瘠形托病,三年一日,此遍国所共闻,有心所共叹。

陈梦雷被赦免死,不能忘也不敢忘的更是君恩。他一方面开馆授徒,培养人才,期望他们能有所建树以报国尽忠。如《诗集》卷三《戒诸生》批评学生耽于游戏,不思进取,要求他们“励志宜终始”(其二)。虽然自己“十载飘零后,萧然老病侵”,但只要“诸生能报国”,也可“差慰逐臣心”(其三)。卷八《劝诸生》其一又有“绛帐开来已十年,逐臣方寸矢苍天。得人报国平生愿,此愿而今恐渺然”的期望和担心。另一方面接受奉天府尹及承德、海城、盖平等县令的邀请主修地方志,努力作为。他也劝勉朋友们积极进取,如写信鼓励杨文言积极作为,“无作小山丛桂之恋。”(《文集》卷十三《答杨道声书》)谆谆告诫同年德格勒“臣子致身之日也,所愿入告根本至诚,要归忠厚,毋杂申韩以伤国家元气”。虽然自己“沦陷汨污,湔洗无日,求为圣世扶杖观化之民不可得”,但是“朋友能行其志,犹慰所怀”。述及自己“梦寐中君国民生犹殷然在念,觉寤,不觉泪之盈睫也”。正如得一道人所言:“尺幅中忠爱之思,溢于言外。”(《文集》卷十三《与德子萼书》)

陈梦雷在奉天始终没有放弃救赎,当康熙三十五年(1696)捐赎未果后,他意识到唯一可行之法便是面见康熙表其忠心。此招果然见效,康熙三十七年(1698)冬终于得赦回京。对皇上再生之恩他感激涕零,更加抱定了竭尽余生以报效的想法。这种情感在其后期作品中多有表现,如《文集》卷一《三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疏》极为动情地记录了在抚顺拜见康熙的整个过程,并表达了效死图报的迫切心情:“臣何人斯?乃蒙我皇上非常之恩,大小臣子稀有之遇。凡有血气心知,无不闻风感泣。而臣进京已一月,未效涓埃之报,臣昼夜何以自安?伏念臣赋性愚拙,筋力孱弱,止此一点血诚,此外无一可

以自信,而效死图报心切,虽赴汤蹈火,有所不避。”康熙四十一年(1702)冬,五岁之女、三岁之男相继因天花殇,他忧伤成疾,康熙得知后书“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20字以赐,梦雷感泣不已;允祉上报此情,康熙说“朕活之至此而三矣,其感泣宜也”,梦雷知悉,连夜带病作《蒙赐御书恭纪圣恩歌》,表达了“恩再三而逾分,报万一以何能?刻骨竭诚,犹愿抒忠于奕世”的感激和忠心。得一道人对此诗有“实境实情,信手写出,尺幅中声与泪俱,诚能格天,非虚语也”的评价。(《文集》卷二《蒙赐御书恭纪圣恩歌有序》)自回京至再贬,作为皇三子的侍从,他23年如一日辛勤工作,先是以一己之力量,编纂了3600余卷的《汇编》,后经康熙特旨,在此基础上纂修《古今图书集成》,他对皇恩的报答不可谓不竭力、不丰厚。

可是,对于陈梦雷的竭力报恩,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康熙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残忍拒绝了陈所提回乡一次以祭奠父母坟墓的恳求。雍正上台后更是迅速将他远谪,不知年过古稀的他在戍所时对自己尽心效忠作何感想。事实上,陈梦雷的忠君有着很多无奈,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的专制时代,个体根本无力与强权抗衡,其生死完全由最高统治者掌控。耿乱中他不得已而投降,其后即便想做一介布衣已不可得,因此,他的忠君也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妥协。只有妥协,才能生存;只有效忠,才能实现建功立业、著书立说的理想,也才能让亲人过上稍好的日子。他晚年在给陈东启《数学举要》作序时说:“人生遇合,如风吹落花,或厕或茵,风不必有爱憎,花亦可无德怨计……比入都而竭思鉢肾,著述万千,苦口披鳞,剖沥肺腑,亦只如风行云逝、花谢水流,其于德怨功罪、荣辱升沉,固无一可必也。”(《文集》卷十《陈东启数学举要序》)在历经磨难、阅尽沧桑后的洞达中有着深深的无奈。当康熙不允其回乡省父母坟墓后,他活着的唯一姿态便是效忠;当新主子认为他不能为自己效忠且有威胁时,便又被发配了。

三、欲孝而未孝的痛楚

陈梦雷是个孝子,耿乱前几乎没有离开过父母。中进士后全家进京,因母亲水土不服而返乡,却遭遇耿乱。面对逼诱他无所畏惧,然而其父被执,他却不得不慎重考量,最终为保全父亲而选择了伪降。耿氏败后,他为了辩白,不得不独自奔波。在旅途中,他对父母家人始终无比牵挂。然而随着他的入狱、贬谪,母亲、父亲相继离世,留下的只有无尽的苦痛与悲思。陈氏不少作品表达了对父母的孝思,情感动人。

康熙十七年(1678)秋刚到京,他就期望能赶快回去,“恐动高堂念,宁堪远地留”(《诗集》卷三《燕邸书怀》)。担忧父母生活无着落:“只恐承欢缺,谁为继糗粮。”(《诗集》卷三《寄家书》)为了安慰父母,他报喜不报忧,言自己身健兴长,问题也不要紧,只是担忧不能侍奉二老。又叮嘱三弟勤学以慰父母:“聊将辛苦志,差慰老亲心。”(《诗集》卷三《寄长秋弟》)次年冬再次进京,在苏州就寄信给两位弟弟,叮嘱二弟“辛苦贫家愁菽水,岁时强笑慰亲颜”(《诗集》卷四《吴门寄二弟》),告诫三弟“书声午夜莫辞寒。肯将攻苦娱晨夕,倘慰高堂得笑欢”(《诗集》卷四《寄长秋弟》)。孝子至情,于此可见。

康熙十八年(1679)底,家中接到吏部革职的通报,受此打击,其母“从此郁郁成疾,庚申岁(1680)之七月,遂见背矣”。梦雷于狱中得知此消息,“五内崩裂”,“日号恸,设佛像为先慈礼诵五大部经,蔬食月余,毁瘠骨立”,然而“又恐以系西曹事伤先府君心,家信讳其事,密札与孺人,令勉力家政,以慰老父”。(《文集》卷十一《为蒋公募化建大护国寺引》)。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以死罪论处,消息至闽,“城内外骇沸,族戚造家问讯,日以百数,皆谓旦夕且不测”,后得知李光地上疏留中,“急欲安老父,从飞递谬以宽勉信附邮”(《文集》卷十九《原皇清敕封孺人先室李氏行述》)。发配奉天之次年,其妻亦被发遣,临行辞别时,其父泫然曰:“圣天子明见万里外,吾儿归容有日。虽然,吾老矣。儿媳行,何以慰吾

望儿念耶?”梦雷说他“述及此”,“肠断欲绝”。读者读之,也会潸然泪下。康熙二十三年(1684)春,当闻知父亲已于上年冬去世时,他悲痛不已,写下了感人肺腑的《皇清原敕封征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乡饮大宾七十四寿斌侯二府君行状》(《文集》卷十九),开篇直抒作为人子不能侍亲、父死而又不能奔丧的剧痛:“吾父年高,不孝梦雷不获侍养,病弗及视药,八千里外闻讣,而身在牛马,欲奔赴哀号,呼天抢地而不可得。不早从吾父于地下,苟延视息,虽生犹死。”想到父亲“乃以望耄之年,目击籍没之惨;吁帝阍而无路,望子妇而不前”的凄惨,想到二老相继离世,而自己“俱不及侍养,病皆不及问医,将来窆且不及临穴”,肝肠寸裂,直呼:“天乎,地乎!惨至此极哉!”本欲求取功名以光宗耀祖,熟料父母却因自己而早亡,他后悔至极:“向使不孝不汲汲为禄,养抱遗经,守二人膝下,当不应遭荼酷至此!即幸登仕籍矣,而能谨守严训,沉潜学道,柔顺足以孚友朋之心,静晦足以消逆党之忌,亦不应遭荼酷至此。”陈的悲痛是经历了生死磨难之后的切肤体验,自然打动人心。黄鸢来评曰:“韦氏《述祖》,欧公《表阡》,此文兼擅其胜。末段又加以悲痛惨怛,令人不忍竟读。”确实如此。

陈梦雷赦免归京后成为皇三子之师,位尊名高,且三次获得康熙御书、对联之赐,荣耀一时,然而四次上疏告假归乡却均未获批,内心痛楚,一再行之于文,如:“臣有父母,而生皆不能奉养,病皆未侍汤药,歿皆未亲殓含,葬皆未得临穴恸哭,犹偃仰偷生于世,何以为人?”(《告假疏》)“臣当年身羁刑部之时,臣母在籍身故;及发遣奉天之后,臣父在籍病亡。臣生俱不及奉养,死俱未视殓含,而臣弟幼弱,又值家难,父母草草葬埋,俱未得所。今蒙圣恩宠荣至此,竟不一念及父母坟墓,则与禽兽无异,何颜侍立皇子之傍?”(《文集》卷一《四十八年二月请假疏》)“臣前于康熙十九年内羁禁刑部之时,臣母在籍病故;康熙二十二年,发遣奉天之后,臣父在籍身亡,草草葬埋,至今未得望坟墓哭奠一番,日夜痛心泣血。”(《文集》卷一《四十九年请假疏》)其情之悲,令人落泪感喟。为了获得回乡许可,他保证“求暂假回家省视哭奠一

番,往返不过五六个月,则万愿俱毕,此后未死之余年,无一刻非报恩之日”,然而终究没能打动康熙。晚年再贬卜魁,死于贬所,乾隆六年(1741)其子圣奖将其骸骨带回故乡安葬^{[1]20},这才算回了家。自其于康熙十八年(1679)离家,已过去了整整62年。

四、知音难觅的孤独与朋友失信的痛恨

耿乱之初,胁迫一切知名人士,李光地也被迫来到福州,见陈梦雷后,与杨道声一起商议脱困之法,约言互保。康熙十四年(1675)五月李光地上蜡丸疏,次年呈京。^[8]陈对蜡丸署名并不知情,但担忧朋友失信,希望他不忘初心来相助的心理却是显而易见,在当年冬所作《乙卯拟古诗十九首》《西郊杂咏》(《诗集》卷一)中表现得最为显豁。如“岁月已悠悠,惧君不我屑”(《行行重行行》)、“知音良未易,中夜独永叹”(《西北有高楼》)、“道远难同心,惧君不我宝”(《西郊杂咏》其十七)、“结发与君知,相要以终老。何当一分手,弃置在远道”(《青青河畔草》)、“念我同心友,忧思常苦并。金石岂不固,寒暑移尔情。……愿君贞初志,努力全令名”(《明月皎月光》)等。

李光地因蜡丸疏博得康熙帝的欢心,升为内阁学士。消息至闽,恰为耿精忠投降之时。李来福州,答应为梦雷呈情。因为有约在先,陈寄予厚望,然而李一再迟延,令陈内心不安。《诗集》卷四《秋兴八首》就有“长剑倚天歌楚调,凄凉宋玉少知音”(其四)之悲叹。因当时陈以“胁从”从宽处理,他觉得问题可能不太严重。但是事态恶化,先是部议降职,后有“蜚语之讹传、椒房之加怒、逆党之诬告”(《文集》卷四《与富云麓先生书》),竟至锒铛入狱。此时唯寄厚望于李,但是李仍旧拖延,遂心生怨恨。《西曹坐系书怀兼寄两弟》其四以“酬恩旧拟婴同杵,信誓谁知左负羊”句,化用《史记·赵世家》所载程婴杵臼合谋保全赵氏孤儿事与《烈士传》所记燕国羊角哀与左伯桃为友死之典,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和怨恨。李对营救陈委实消极,最后是在徐乾学的请求下,由徐代写一

疏,李仅签名而已。上疏效果很明显,陈由大辟转为谪戍奉天。但是陈仍以为李言而无信,疏中未言及二人合谋事,希冀的赦免未能达成,因此郁愤难平,写下了著名的《与李厚庵绝交书》。此文开头即交代二人深厚交情,并严词斥责对方用心险恶:“初终殊态,猜忤其心,险幻其术,几陷不孝丧身覆巢而不悔也。”然后详叙二人交往经过与耿乱初合谋的细节以及后来事态发展的经过以及绝交之因。对李之不救,初揣测为“思抑不孝以掩其往事之愆”,尚可原谅。而当陈需请福建督抚呈文,陈父“以抚军在泉,遣使具呈请咨到京”时,李“竟留其呈词,不令投致,巧延家人,三月不遣”,有意拖延;“又恐同人别为介绍,贻书巧说,阻其先容”,错过了最佳救助时机时,陈大疑其用心。回乡后李当着都统将军面“阳为具揭代白”,后知其“不过欲留不孝军前以阻入都之路”,“惘然惊惋,不食积日”,意识到对方“用心之险,然未敢尽以为信也”。李又负约未上疏,且对冯溥言“陈某十七年入都,为耿逆探听消息”,还遣责陈为何不死,让陈的信任彻底坍塌,由怨而生恨,最终与之决裂。此文叙事详实,情感凄恻动人,后经徐乾学进献于康熙帝,康熙三十二年(1693)仆人杨昭又将其刻入《闲止书堂集钞》,一时影响极大,对转变他在康熙心中的形象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贬谪沈阳时所作《抵奉天与徐健庵书》《又与徐健庵书》《与富云麓先生书》《与给谏彭无山先生书》《贺徐健庵总宪书》等文都有对李光地失信的谴责。陈对李的“不救之失”“下石之恨”长期不能释怀,这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闻听时任直隶巡抚的李严刑拷打致12人死亡而隐瞒时便欲拟疏弹劾即可见。由于李一直受康熙重用,陈出于无法撼动的徒劳和自身安危的考虑,只能长期隐忍。

陈梦雷一生,“其所阅历,贫贱以之通显,百死而得一生,举凡史册所载,遭遇之奇,功罪之致,无一不身亲而备尝之”(《诗集》杨文序)。他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投注入诗文创作之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无论是因不得不投降耿精忠而背负不忠恶名的痛苦以及贬谪

奉天为奴的耻辱,还是朋友背信弃义的孤独、愤懑与痛恨;无论是欲尽忠建功而不得的苦痛,还是终身报恩的执着与无奈;无论是欲孝而终未孝的自责、亲人亦因己而遭受苦难的悲痛,还是终生一省父母坟墓而不得的悲苦无奈,都是他不得不言说的“情”。复杂丰富的情感铸就其诗文的感人情怀。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云:“诗者,吟咏情性也。”^[9]陈梦雷论文,亦首重性情,他说:“论文章者求其真而已。有真性情而后有真学问,有真学问而后有真事功,此不易之论也。”(《文集》卷九《黄叔威见山堂集序》)以为《三百篇》、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苏轼之诗,皆“性情之言”;杜甫《北征》《诸将》诸篇,其佳不仅“独在声律字句间”“亦以其性情所寄者”(《文集》卷十《洪秋崖诗序》),田肯斋之诗“性情所寄者远”(《文集》卷九《田肯斋先生诗序》),故加以揄扬;洪秋崖论诗“一以性情之真为主”,故深表认同。正如韩愈所言:“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10]陈之悲剧人生及其强烈情感,造成其诗文感发人心的核心力量,这些情怀往往相互纠结交错甚至矛盾冲突,显得极为丰富复杂而又婉转激荡。正如郭沫若说屈原“深幸有一,不望有二”^[11],陈梦雷之遭遇,人皆不愿遭遇,而此遭遇所造就的作品的感动人心,也较少有人能匹敌,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参考文献]

- [1] 张玉兴. 关于陈梦雷第二次被流放的问题 [J]. 清史研究通讯, 1984 (2): 19-21.
- [2] 苍弁山樵. 吴逆取亡录 [M] //丛书集成三编: 第99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7: 989.
- [3] 江日昇. 台湾外志: 卷十六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55.
- [4] 滕绍箴. 三藩史略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039.
- [5] 刘凤云. 清代三藩研究 [M].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2: 186.
- [6] 李桓.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陈梦雷传 [M] //清代传记丛刊: 第148册. 台北: 明文书局, 1985: 275.
- [7] 毛茛, 传, 郑玄, 笺, 孔颖达, 疏, 陆德明, 音释. 毛诗注疏: 卷十三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141.
- [8] 李清植. 文贞公年谱 [M] //李光地. 榕村全集: 第十册.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 17.
- [9] 郭绍虞. 沧浪诗话校释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26.
- [10] 韩愈. 荆潭唱和诗序 [M] //刘真伦, 岳珍.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 卷十.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1121-1122.
- [11]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第19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183.

The Emotional Connotation of Chen Menglei's Work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ZHANG Xiao-hong, YUE Meng-s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root of Chen Menglei's tragic life lies in “the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Chen's rough life, rich experience and complex emotions are well reflected in his works. They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four aspects: he suffered hardships of life, and was sorrowful for his pretended surrender and this dilemma between his loyalty to the emperor and his filial duty to his parents; he was sorry for his helplessness despite his commitment to his emperor; he was extremely sad for his failure to fulfill his filial duties; and he was lonely and hateful for his the betrayal of his friends.

Key words: “the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Chen Menglei's works; emotional connotation

(责任编辑 林 芎)